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现代夸父

XIAN DAI KUA FU

陈贻林 著

▼毛泽东周恩来的生死情缘

▼李讷曾经的青春岁月

▼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中央电视台有个刘将军

▼“儿子眼中的父亲——耿飚

▼“下辈子不再做导演”

▼黄道培美国蒙冤记

现代夸父

陈贻林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夸父/陈贻林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

ISBN 7-5039-2682-1

I. 现… II. 陈…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647 号

现代夸父

著 者 陈贻林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吴文越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82-1/I · 1230

定 价 19.00 元

目录

毛泽东周恩来的生深情缘	1
人民公仆王大将	19
儿子眼中的父亲——耿飚	42
周巍峙自嘲：“我是打杂工”	53
诗人贺敬之投奔延安记	64
“留下珍珠串串”	74
国家栋梁	82
一代女杰洪秀枝	104
李讷曾经的青春岁月	130
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143
中央电视台有个刘将军	159
李振盛，一位追梦成真的人	170
“下辈子不再做导演”	193
荣辱不惊董加耕	214
最后的廖初江	230
一代名医“小儿王”	259

现代夸父

- “华美”乐章总指挥………269
- 黄道培美国蒙冤记………277
- 摘取太阳能技术桂冠的华裔科学家施正荣………288
- “拓荒牛”卢鸿炳传奇………304
- 大山的儿子………319
- 集诗书篆画于一身的艺术家………328
- “中华鼓魂”采风第一人………333

毛泽东周恩来的生死情缘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时指出：
“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就绝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恩来，
它就会烧光，只剩灰烬。”

——题记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吴连登、朱金顺先后从人民大会堂调到中南海工作。吴连登成为毛泽东最后的管家，直到1976年9月将毛泽东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为止，整整12个年头。朱金顺则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从进入周家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长达10年。他俩耳濡目染了两位伟人半个世纪的情缘，可谓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这天，他俩敞开心扉，用做人的良知和人格，深情叙说两位伟人那感天动地、如诉如泣的生死情缘——

一、千锤百炼，经受了长期战争的考验

井冈山斗争时期，周恩来坚持道：

“泽东同志留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我们赢得战争很有好处。”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去法国玻尔托斯号上，周恩来从一群湖南学生口中知道了毛泽东，并对在上海码头与前来为赴法青年送行的毛泽东失之交臂感到惋惜。巴黎——长沙，蔡和森成为他俩共同的“前辈”。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通过巴黎与长沙间长久的通信交流，而对周恩来则是在法国面对面的教诲和熏陶。

1925年10月，在广州，两位彼此仰慕已久的年轻人都走到了一起。他俩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恩来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广州会见，成为他俩长达半个世纪为改变中国命运而结下生死情缘的开端。

井冈山斗争时期，立三、王明路线的干扰，致使毛泽东遭到批判斗争，败走麦城，地位一落千丈。处在夹缝中的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一次次地排除干扰，时而正面时而委婉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攻打赣州。他们天真地认为拿下赣州，中央政府进驻以后，就可以宣布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当时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个计划。攻打赣州虽然以失利告终，但是，苏区中央“汉口会议”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政治部训令》却称：“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以反对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苏区中央的一些人决定要撤去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1932年秋，宁都城外的农家小屋。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史称“宁都会议”正在进行，声声批判犹如支支利箭刺向毛泽东。毛泽东针锋相对，据理反击：“是的，过去7个月来，确实都错了。我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我主张东征打漳州，结果，打漳州大胜。到底谁对谁错？”就在这僵持关口，周恩来飞马赶到。他凝视着情绪激动的战友们，先温和地批评“泽东同志对中央指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接着，话锋一转进入主题：“泽东积累多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我的意见是，泽东同志留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我们赢得战争很有好处。”周恩来提出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在周恩来一再力争下，会议终于通过了他的第一方案。

不料，数日后中央改变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临行前，周恩来专程到他的住处探望，毛泽东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豁达而真挚地表示：“前方何时电召，何时再来！”周恩来有力地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一定！”然而，直到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毛泽东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前方。

长征路上，毛泽东命令道：“不管什么代价，一定要把副主席的病治好！”

提起长征，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若不是周恩来据理力争，毛泽东将会被留在江西苏区。

1934年9月，毛泽东奉命到云都布置红军战略转移。他哪里知道，博古此时已把他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名单。周恩来尖锐指

出：毛泽东是红军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长征，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博古不得不同意毛泽东随军长征。

遵义会议上，党内两大巨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肩并肩站在一起。作为中央常委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实际情况是，周恩来心甘情愿地担当起毛泽东军事决策的具体执行者，负责后勤、战斗的具体准备工作及照料人员和武器。只要毛泽东摊开地图，把自己的设想、计划讲（或写）出来，周恩来参与讨论、完善，加进一些内容，就能心领神会，执行起来也是得心应手，胜券在握。每天夜里，他都要和毛泽东碰头商量，决定下一步行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没有周恩来高，遇到问题总是由周恩来去做说服工作。尤为难得的是，周恩来始终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应该的。

两位伟人在生活上更是相濡以沫，情同手足——

卢定桥，一座由 13 根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连成的铁索桥。桥上窄条木板飘荡在汹涌的河水上方。走到桥中间的周恩来听警卫员报告“有一块木板裂开”，他立刻想到毛泽东的安全，连忙说：“我们修一修，铺好了让毛主席他们好走。”说着就和战士们一道，赶在毛泽东到达之前，亲手把桥上的一些破碎桥板换掉。

1935 年 8 月，中央红军正要过草地，周恩来不幸患上肝脓疡。这种病，高烧难退，昏迷不醒，在长征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很难治好。“傅连璋能不能回来？”毛泽东焦急万分。“太远了，回不来。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姓戴的医生……”卫生部同志报告说。毛泽东立即命令道：“快，立即发电报，叫那位姓戴的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不管什么代价，一定要把周副主席的病治好！”

在周恩来病势沉重的日子里，毛泽东每天都挤出时间去看望，亲自了解病情。每当部队来人，他总是嘱咐“去看看周副主席，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他还指示彭德怀负责照顾周恩来的行动。为了部队行动时能让周恩来躺在担架上，他交代彭德怀，将红军仅有的8门迫击炮扔掉两门，腾出40名战士抬担架。周恩来生病两个多月，毛泽东既操心着他的病情，又要将他所负责的工作担负起来。

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面对混乱局面，当机立断对警卫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要保护主席的安全。”

1945年8~9月，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重庆谈判。周恩来把他的安全和健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与毛泽东形影不离，生死与共；对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更是一一过问，简直成了警卫员。

毛泽东在延安登机前，周恩来亲自检查机上的安全设备，并叮嘱随行人员：“到重庆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一点疏忽。”他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想到“火盆重庆”的酷日，连忙摘下自己头上戴的帽子亲手给毛泽东戴上。这就是毛泽东登机挥手告别时戴的那一顶。

周恩来一回到红岩村，顾不上喘口气，忙着检查给毛泽东准备的床铺，亲自在上面坐坐，是否摇晃；在椅子上躺躺，是否平稳；连被褥、枕头都一一检查。他还到炊事班强调注意饭菜卫生，关照炊事员“每餐为主席准备一小碟辣椒”。

他为了随时协助毛泽东的工作和照料其生活，住到毛泽东住房的对面。即使这样，他仍不忘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常常在深夜查哨、站岗。宴会上，当人们涌向毛泽东频频敬酒时，他主动地一一接过来，

替毛泽东喝下去。此情此景，令在座的民主人士感叹不已。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苏联民族生活展览，会长孙科盛邀毛泽东、周恩来前往参观。“毛主席来展览馆啦！”人们争先恐后地汇集过来，要亲自看一眼毛泽东。人，越来越多；竹房，摇摇晃晃。周恩来马上插到毛泽东前面带路，想引导他退出会场。毛泽东却坚持看完再走。结果，陪同参观的张治中、冯玉祥被挤得不知去向，警卫人员只能簇拥着被围在黑压压人群中的毛泽东缓慢地往前走。面对混乱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地对警卫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要保护主席的安全。”说罢，他在前面开道，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道：“请大家让开路，请大家让开路。”周恩来在前，左右和后面各一名警卫员，寸步不离地将毛泽东围在中间，簇拥着走出展览馆。

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毛泽东将于第二天飞回延安。蒋介石虽然打消了软禁毛泽东于重庆的念头，但又不甘心放虎归山，决计在毛泽东返延安途中下手，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专机将毛泽东送到延安。周恩来一听，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万幸的是，蒋介石要张治中10月11日去兰州办理公务，他不由心头一喜，马上找到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不放心啊！”请他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后再去兰州。张治中立刻明白他的用意，慨然应允。后来，周恩来曾对张治中谈及：“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解放战争中，他俩常以黑豆、糠秕和瓜菜充饥；他俩常常坐在农家小院的树桩上，将锅盖放在膝盖上当桌，批阅文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从1947年开始兼任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策划和指挥了这场从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相去万里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毛泽东回忆道：“胡宗南进攻延安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则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全体中央机关人员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生活过。两位伟人对自己的要求依然很严格。他俩行装简单，生活俭朴，膳食普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俩和当地百姓一样，常常以黑豆、糠秕和瓜菜充饥，有时连续一个月吃糠菜糊糊维持生命；他俩常常坐在农家小院的树桩上，锅盖当桌，放在膝盖上批阅文件……

在此如此艰难的岁月，周恩来仍时时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想尽办法减轻他的劳累。前线发来战况报告，他为了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请毛泽东阅示。当毛泽东休息后，他除特急电报，从不惊扰。行军途中住窑洞，他坚持让毛泽东住在里边，自己住过道。他清晨起床习惯咳嗽几声，总是快步走到院子外边去。

这天，周恩来从叶剑英处返回杨家沟住地。叶剑英派警卫员护送他。快到杨家沟住地时，周恩来突然收住脚步，压低声音对警卫员说：“把电筒关掉，小声点，前面亮灯的地方是毛主席的住处。他正在办公，进院子时，脚不要踢在门槛上。”快要经过毛泽东窗前了，他的脚步更轻了，再一次凑到警卫员耳边，悄悄地关照：“慢一点，脚步要放轻，不要惊动毛主席。”

二、肝胆相照，经受了风风雨雨的洗礼

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使毛泽东访苏达到高潮，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密协作、默契配合的杰作。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岁寿辰，毛泽东率领由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师哲参加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会见中，斯大林问毛泽东：“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要他谈谈想法和愿望。毛泽东答非所问，表示打算请周恩来来一趟。斯大林不解：“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干什么？”他心想：苏中两国无论签订什么条约和协定，都应由代表2亿苏联人民的他和代表5亿中国人民的毛泽东来签署。对斯大林的一再询问，毛泽东未做明确答复，因为毛泽东赴苏前就明确强调“凡属政府范围的事由政府颁布”。他为斯大林祝寿后准备在苏休息、参观访问、了解俄国和西方历史。至于谈判和条约签订是政务院的事，应该由周恩来去办。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去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为了便于与毛泽东联系，他从较远的一幢别墅搬到毛泽东住处的楼上办公，朝夕相处，共商大事。其间，斯大林三次直接给毛泽东打电话，因为他不清楚拟定中的条约该由谁来签署。毛泽东的回答依然是答非所问：“我没有意见，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

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在苏联人民乃至中国人心中都是极高

的。但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并不买他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当面坚持让斯大林到他指定的地点参加中方答谢宴会。斯大林表示，他从来没有到别人确定的饭店赴宴。毛泽东寸步不让，坚持要斯大林给他一个例外。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别人意见。毛泽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首脑中第一个当仁不让地将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位置上的人。宴会上，各大使议论最多的是：“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得到！”毛泽东的无畏举动，使周恩来深受鼓舞，不遗余力地对答谢宴会做了许多周密的指导和布置。

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使毛泽东访苏达到高潮，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密协作、默契配合的杰作。

“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周恩来珠联璧合、全球为之震惊的经典之作。

“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周恩来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这里，且不论两位巨人借“小球转动了大球”，按照他们的缜密策划一步一步地顺利打开了我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门，也不说超级大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被世界政坛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单从毛泽东、周恩来频频抛出令西方人措手不及的和谈信息，以及接待尼克松准备工作的一点细节，就可以看到由毛泽东独具匠心，运筹帷幄，周恩来心领神会，精心导演了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生动一幕。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明确指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他如果想到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

悄悄的，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这年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斯诺夫妇握手，并一道走到栏杆前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周恩来立即精心安排《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同斯诺夫妇参加观礼的照片。这张含蓄却寓意深长的照片，实际上是我国政府抛向美国政府的一个球：改善两国关系，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没有接过这个球。正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观察事物的敏锐力估计过高。他们传出的信息是那么的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星移斗转，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由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哥恩的交往，引发了美国乒乓球队申请到中国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毅然做出全球为之震惊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周恩来迅速行动，有声有色地导演了一段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的“小球推动大球”的插曲。而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过程，更加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的布置周密，用心良苦。

“尼克松是我请来的客人，在他的住处挂上唐宋元明清的字画，告诉尼克松中国历史悠久。”毛泽东说了话，周恩来马上亲笔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写信，由吴连登前往借回了一批字画。怎么挂呢？周恩来好生为难。原来，那时的钓鱼台国宾馆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楼宇里，墙上挂的许多是江青的摄影作品。这回要是撤下她拍的照片，还了得，不晓得她要闹出什么事！

“文革”后期，鉴于毛泽东健康等原因，中央为他配备了联络员。毛远新是毛泽东与江青、王洪文等人之间的联络员。而毛泽东

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则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她俩觉得江青此事做得过分，主动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罢，一言不发，让张玉凤通知江青马上过来。

“钓鱼台到处挂你拍的照片，你在搞什么？”毛泽东劈头就责问江青。当时的江青，可以说，普天之下仅怕两人：一是毛泽东，二是她惟一的女儿李讷。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对江青要求严，批评时不留面子。江青十次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就有五六次要么不高兴的样子要么流着泪。但是，她几乎每次都能猜出是谁告了她的状！这一回，她面对毛泽东的责问，颤声表示道：“我马上把照片拿下来。”说罢，哭着走了出来。她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承认道：“我没有按主席思想办事，我有错，回去按主席指示办。”

“如果不是总理将胡旭东派到主席身边，主席这个梦很可能就有醒不过来的危险！”“两位伟人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事三天三夜说不完！”

“六七十年代，我见过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主席这里最多最勤最随便的是总理。他与主席完全是老朋友、老战友。总理一见到我们，头一句话就是：‘主席身体怎么样？吃得怎么样？睡了几个小时？’主席对总理同样尊重，关怀备至。主席说过：‘我只过问两件事，一是人事，用人的问题；二是我还可以出点点子。其余所有的事让总理去办，多点时间让我看书。’主席说到做到，绝不食言。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党政军民学，总理都可以管。无论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政治局碰头会，就是‘文革’中的‘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或‘中央文革碰头会’，往往都是由总理主持。主席要到外地巡视，第一个要报告的人是总理。主席最后几年所做

的批示，都经过总理。至于主席要找总理开会，总是让秘书了解清楚总理在哪里、干什么、睡了几个小时后，再决定在哪儿开会。主席和总理情同手足。”这是吴连登的亲身感受。

“总理对主席也是尊重爱护，肝胆相照。就说开会吧，如果主席休息得好，睡眠充足，会议内容就多些，时间也长些；如果主席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总理主持会议内容就少些，时间也短些。为了减少主席咳嗽，总理要求参会者不要抽烟，结果没有一个人抽烟。总理尊重爱护主席的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朱金顺不假思索地叙说起那感天动地的一件件往事——

每次活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五一”、“国庆”上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没有由有关部门操办了事，每次都得先上一趟天安门，对毛泽东将要走的每一级台阶、地毯间的接头处、毛泽东坐的沙发……他都要亲自走一走、摸一摸，然后才赶回颐年堂接毛泽东。在周恩来指挥下，每年庆典活动有条不紊。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整整10点钟，《东方红》骤然响起，毛泽东向欢呼的群众频频招手……时间掌握上百分之百的准确。

1969年冬，中苏边境珍宝岛燃起战火。“北边一触即发，怎么办？”最先得到这一消息的周恩来电话请示毛泽东。“主席刚服下安眠药。”值班的是护士长吴旭君。她听出总理有急事，忙说：“我去叫醒……”“不用，不用。我现在就去游泳池，等主席什么时候醒了，我再当面报告。”反过来，他多次交代身边所有的人：主席夜间工作，只要是主席来电话，就是我刚吃了安眠药也要及时叫醒！这一次巧的是，当他匆匆赶到游泳池时，毛泽东正好渐渐醒来。两位伟人一番商量，一番权衡，做出了“自卫还击”的英明决策。

1971年11月中旬，尼克松访华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因老年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导致严重肺原性心脏病伴有肺部感染而突然病